

论辽金朝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逻辑

郭纹廷

[提要]辽金两朝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社会形态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但对辽金国力的强盛和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和特点促成了契丹、女真人侵入中原地区的内在动力;中央集权统治强化了北方地区各民族整合,奠定了多民族政权的治理体系格局;经济结构转变使得北方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相依与互补的关系;军事征伐成为诸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了解和联系的催化剂;对儒家文化的倡导和学习加快了契丹、女真人的儒化进程,使各民族之间共同性增多,最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关键词]辽金朝代;交往交流交融;演进;多元一体格局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3)02—0036—08

作者简介:郭纹廷,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边疆治理、区域经济。北京 100094

辽金两朝都是由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勃兴于五代时期的契丹政权,及其后曾为海东盛国诸部之一的女真完颜部政权,为了进一步拓展本民族生存空间,都南下进入内地,成为与宋王朝分庭抗礼、争夺中原正统的强大政治力量。强盛之时的辽地幅员万里,东至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至白沟(今北京南面琉璃河),北至胙胸河(今蒙古国境内克鲁伦河)。金本是东北地区的小部落,自完颜阿骨打灭辽称帝后,疆域从松花江流域向内地扩展至大散关、淮水一线,疆域可谓辽阔。辽金时期南北政权的分裂与对抗,使得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复杂多样,同时,各民族人口流动进入空前活跃与大发展时期。契丹、女真人因征服战争进入中原地区后,长期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移民实城、戍兵屯田、朝贡、互市贸易、习儒诵经等,逐渐接受汉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辽宋夏金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目前学术界在辽金朝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对辽金两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逻辑研究甚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从五个维度做分析阐述。

一、自然地理环境:地域空间的封闭与伸张

契丹族发祥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西,土河(今老哈河)之北,始以渔猎为生,逐渐发展为

“马逐水草,人仰湏酪”的游牧生活。契丹族早先主要活动于辽河中游的松漠地区。其后日渐兴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势力范围东接高丽,西接奚,南接营州,北接室韦,并对外继续延伸。公元553年,契丹部族受到北齐文宣帝大军的进攻,损失惨重。后臣属于突厥,隋唐之交,开始成为中原王朝的羁縻统治地区。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其地设置为松漠都督府(今翁牛特境内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交汇处附近),并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设置东夷校尉,兼辖松漠、饶乐二都督府。耶律阿保机当国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大量幽涿之地的汉人进入辖地,再加上阿保机南下征伐掳掠来大量汉人,因而阿保机自别一部,在古汉城(今承德西南),“率汉人耕种,为置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1] (P. 1785)},开始从草原游牧生活向农业耕种生活渐进转变。

《魏书·契丹传》中记载,“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进,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今辽宁朝阳)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2] (P. 2223)}由此而知,早期契丹人与奚人相安在松漠地区,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公元911年,阿保机征讨西部奚族,“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

书籍。”^{[3] (P.4-5)}从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到公元1125年辽灭亡,契丹人的拓居地扩大了数倍。然而,笔者认为,早期松漠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对于契丹人生活习性形成以及扩张征伐具有重要的影响。

古代松漠地区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蒙古高原、燕山山脉北麓、辽河平原的复合交接之处,群峰环绕,河淀棋布,其东面是辽河平原,“地多松柳,泽饶蒲草。”^{[4] (P.347)}南面是阴山和燕山山系,包括松岭、努鲁尔虎山、七老图山等,西面是大兴安岭和蒙古高原,其地榆柳丛生,北面是辽阔丰饶的东北平原。白岔河、西拉木伦河、小滦河、阴河、伊逊河等许多河流发源于此。由于地处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古时松漠地区具有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征,春季干旱少雨,冬季风大寒冷且时间长。据《辽史·营卫志》记载,“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3] (P.423)},宋朝人路振在《乘招录》中也有记载“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5] (P.8)}由此可知,松漠地区寒凉干冷的气候特征。

从地理单元上看,契丹辽“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陁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苇。”^{[3] (P.495)}总体的地貌特征是:边缘高山丛林环绕,内部由辽阔的平川、高低起伏的丘陵、宽广的盆地、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等地貌单元排列而成。环绕其西北、西南、东南部的蒙古高原和山地,形成了易守难攻的U字型堡垒地势,同时横亘于此的阴山、吕梁山、太行山,及蜿蜒于山畔的黄河又形成了天然屏障,封挡着辽人南下的道路。因此,契丹人早期繁衍滋蔓之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在保障契丹人生存和繁衍的同时,也使其生产生活水平与中原地区形成差异性和差距性,正因为此,契丹人必然受到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吸引。

从气候特征来看,从松漠地区向北,跨过西辽河,有辽阔的松嫩平原和丰富的松花江水系,这一地区气候特征相近。竺可桢等学者对我国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结果表明,隋唐时期气候为和暖期,北宋时期气候转冷,南宋时期气候转寒加剧^{[6] (P.15-38)}。隋唐时期气候温暖,有利于草木及农作物生长,也为北方契丹等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到了两宋时期,北方地区气候变冷变干,使得农作物种

植范围和产量受到影响。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年均气温下降一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百分之十;降水量下降一百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百分之十^{[7] (P.8-15)}。虽然契丹人以游牧生活为主,但农业种植是其生活的重要补充,因此,人口繁衍增多而物产不足是契丹人产生外向延伸势力范围的重要原因。同时,自盛唐以来,契丹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程度进一步加深,对中原文明也更加钦慕向往,“大贺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继之,尚主封王,饫观上国。开元东封,邵固扈从,又览太平之盛。自是朝贡岁至于唐。辽始祖涅里立遥辇氏,世为国相,目见耳闻,歆企帝王之容辉有年矣。”^{[3] (P.1021)}为了打开松漠之地南向的道路,契丹人曾多次南侵,最终侵晋成功,据有燕山山脉之险,并取道古北口东下侵取幽州,略取山海关以南地区,彻底摆脱燕山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的限制。自此,古北口道成为辽东地区与中原地区进行交往交流与物资信息流动的主干道。

女真人是辽统治下的渔猎游牧民族,兴起于长白山与黑龙江流域,公元1114年,在部落酋长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乘辽室衰微之际,举兵反辽,占领了松花江流域的大片地区。第二年,阿骨打自立为皇帝,定国号为金,其后连续破辽,占领了辽在东北及河北、山西北部等地区。然而,中原地区的文明和富庶深深吸引着女真人,联宋灭辽之后,金人便开始大举南下进犯内地,并一举渡过黄河,占领了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江苏、安徽北部、陕西中部、甘肃中部南部,与南宋以秦岭及淮水为界。女真人发祥地也是东北的寒冷地带,虽然较早期就发展起了原始农业,但农业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较低。生女真完颜部在按出虎水定居下来后,开始了“耕垦树艺”生活,逐渐强大后开始扩展势力范围。金人南向流动取得了极大成功,与金人“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8] (P.1061)}有着极大关系。南宋时期气候严寒,冷害增多,生活用品缺乏,这样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就成为金人的内在需要。然而,辽金时期大量女真、契丹、渤海等少数民族跨过黄河进入中原地区,大量汉族移居北方,汉人向北方少数民族传播生产、手工业知识,少数民族向汉人学习农作物种植、耕作的经验,并把汉人的铁制农具运用到农业生产中,这些交流和学习,不仅对辽金朝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客观上也推动了北方地区的民族大融合。

二、中央集权统治:以夏变夷与因俗而治相结合

在中国历史版图上可以看到,北方游牧民族为了拓展空间,经常与周边民族发生政治冲突、武力征伐,使民族成份重组与融合成为必然。辽金建国后,以辽河平原为中心不断兼并收抚周边部族,奠定了北方地区的霸主地位。这一时期,战争、人口迁徙、交聘、互市等政治上的碰撞和整合构成了辽金两朝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辽金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形式和政治背景。

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朝贡、互市贸易使契丹人与中原汉人往来密切,也使其逐渐加深了对中原经济文化的了解。正因为如此,辽统治者自认为秉承了中国王朝的正统,如辽道宗认为,“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9] (P.95)}这是辽统治者在政治思想和文化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北方民族崇尚武力,因而在国家治理中推行强力政治统治,但在政治制度上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自耶律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辽朝开始了城郭建设,至辽圣宗时期,辽朝在其统治区建设了上京、中京、东京三大行政中心,其后逐渐形成了以五京为中心、地方以州县为行政建制的行政区划格局。辽朝在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形式的过程中,借鉴了唐朝羁縻府州制度,同时在地方治理结构中融入契丹族的统治特点。辽太宗时期确立了“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3] (P.773)}的“藩汉分治”的治国方针。“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3] (P.773)}辽代这种二元政治体制,由中央到地方,上至治国基本原则,下至边疆治理,处处体现着因俗而治的精神。“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3] (P.843)}余靖在《武溪集》中也有记载:契丹东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居其窟穴,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衣服、饮食、言语各从其俗。凡四姓相犯,皆用汉法;本类自相犯者,用本国法,故别立契丹司以掌其狱。^{[10] (P.180)}这表明辽统治集团运用强力

政治建立起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统辖制度,也为自上而下推动民族间形成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

金朝则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国家治理实践,在东北地区普遍设置行政建制。在政治统治上,金统治集团兼采唐宋辽制,同时融入本族传统制度,使其成为以中原制度为主体、地方多种制度并存的北方王朝。金朝建立初期,阿骨打下诏:“除辽法……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8] (P.32)}把契丹、奚等民族按女真族的猛安谋克编制起来。金王朝的权力核心是“勃极烈”部落联盟制,各种“勃极烈”均由皇室宗亲和显贵担任。但这种奴隶制社会关系下的单一民族政权,对融洽民族关系和巩固金政权存在极大的障碍。金太宗时期开始改革“勃极烈”制,在汉人地区采用汉官制度。海陵王当政时期彻底废除了“勃极烈”制,建立中央集权制。为了协调民族关系、稳定政权,金朝开始任用优秀的汉、契丹、奚等族官员担任政府高级官吏,使金王朝由单一的女真贵族政权发展为多民族政权。多民族政权的形成,推动了金王朝的繁荣和进步,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

在治国理念上,金朝统治者借鉴了隋唐“用夏变夷”“因俗而治”的政治思想和实践,金世宗时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夷可变华”和“华夷同风”思想,主张天下应归有德之君。金代上京路、北京路、西京路的西部地区是契丹、乌吉、敌烈等游牧部族的驻牧区,金政府依照原辽朝的行政统辖建制,以部族制、纥制对其进行统治,形成有游牧民族特点的特殊行政建制。例如,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于上京路西部设乌古敌烈统军司,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改乌古敌烈统军司为招讨司,世宗时更名为东北路招讨司,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改隶北京路,其下统辖的游牧民族建制以部族制为主。西京路下设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其下所辖的游牧民族则主要设纥制统辖,诸纥的主要任务是戍守边防。金朝统辖各游牧民族的军政大权主要是掌握在女真人手中,同时任用游牧部族的本族人担任部族和纥的基层官员,实现对游牧部族的因俗而治。

移民是辽金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控制民族地区、巩固政权而广泛采用的政治手段。辽金两朝的人口迁移主要集中在其政权形成初期,是伴随着统治者的南征及对周边政权的征服战争

而强制进行的迁徙,但在客观上对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开发、民族融合、社会进步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辽统治时期,北上的移民主要来自河东、燕云地区,如神册六年(921年),契丹贵族下古北口,“分兵略檀(今北京市密云区)、顺(今辽宁省黑山县)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3](P.19)}。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徙梁门(治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遂城(治今河北省保定市)、泰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北平民于内地。”^{[3](P.161)}。为了平衡各地区、各部族力量,巩固统治,辽统治者通过移民使不同民族间彼此牵制、相互制衡,“一部或叛,临部讨之,使同力相制。”^{[3](P.1593,1594)}女真建国初期为了镇压辽朝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对契丹、奚、渤海、靺鞨等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迁徙。为了防止中原地区汉人反抗,达到控制监视的目的,金统治者把女真人从东北迁到华北、山东、山西等地,“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中州,与百姓杂处,……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11](P.169)}辽金两朝是我国东北地区和北部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突破期,其北迁移民运动,不仅使契丹、女真等民族遍居中原地区,也使汉人成为北部和东北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从而使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民族交错融居的状态,对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开发的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更高层次展开。

三、经济结构转变:农牧经济相互依存与互补

辽金时期统治集团通过土地开发、促进农牧业发展、扩大商业贸易、构筑交通网络等方式,推动北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为北方地区民族和谐稳定、各民族交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契丹、女真族都是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民族,虽然早期农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并不普遍与稳定,人们主要过着游牧、渔猎兼有农耕的生活。建国后辽金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与发展使得农业区发展到西拉木伦河、辽河、阿什河等流域,农垦区超过了以往朝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辽金两代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逐渐转变为以农业为主、游牧或渔猎为辅的二元经济结构。

契丹部族在大贺氏联盟时期就开始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随着辽统治者将中原汉人大量迁入,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东北地区的经济面貌逐渐得到改变。辽太祖阿保机平定诸弟内乱后,专事农业,将俘获的汉人、渤海人安置于草原地区,并将北部水系充足便于灌溉的地区和土壤

适合耕种的地区都开垦成固定的农业区,使得西辽河流域的北方草原不再单纯是游牧民族的牧场,星星点点的小城镇分布于草原,改变了草原固有面貌,州县与部落交错相间,形成了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独有特点^[12]。实际上,阿保机时期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发展农业为后盾的。鉴于农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辽太宗年间,今内蒙古的海拉尔河地区,蒙古国乌尔顺河、克鲁伦河地区都发展成了农田。道宗初年,“唐古率众田胪胸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今蒙古国布尔根省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3](P.1027)}。辽朝还制定了劝农护农、奖励开荒、减免税收等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太宗会同初诏有司劝农桑,且不以射猎妨碍农事;开泰元年,诏令由国家向田园芜废的民户发放耕牛和种籽以帮助其发展生产,等。由于辽统治者采取了保护、鼓励和支持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国家仓廩充实,国力得到增强,农业在辽朝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农业生产供给的农产品弥补了畜牧产品的单一性,还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形成了农、牧业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盛极之时的辽朝将蒙古草原、克鲁伦河流域、整个黑龙江流域、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辽河平原等的游牧、渔猎、农耕民族纳入王朝统一的行政管理区划之下,初步建立起经济统辖关系,形成了宜农宜牧、农牧互补的经济结构。

女真族在建国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没有货币,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迁居中原以后,为了适应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开始放弃奴隶制生产方式,采用与中原封建制相适应的租佃制,“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采租而已。”^{[8](P.1122)}虽然畜牧业在女真人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但金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农业的重要作用,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轻徭薄赋劝农、鼓励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灌溉设施、推广农业技术等,并将屯田制度作为金朝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太宗到章宗明昌年间,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生产劳动,使北方地区的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和繁荣,“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廩有余。”^{[8](P.222)}。随着对辽、宋战争的胜利和领土不断扩张,金军民屯田区域迅速扩大,屯田点广布于华北、西北各地。金朝中后期时,上京路地区的土地已得到充分开发利

用,农业技术水平发展迅速。女真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北迁的中原汉人和渤海等其他民族的技术传播,如汉人使用的水碓在东北得到使用,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谷物加工机械。此外,牛耕与铁犁也得到推广使用。农业的发展,使牧业也由迁徙不定的游牧向定居牧业发展,极盛时期的金朝牧业“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四千”^{[8](P.1075)}。金代大力发展农牧业经济,使北方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北部地区的稳定,为地区间经济互补、民族间交往交流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商品交换不受民族和社会等级的限制,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中最频繁、最活跃、最有效的因素^[13]。在各取所需的过程中,它使各民族人民自觉自愿地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民族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各族人民友好的交往交流交融。辽金时期,商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农牧业的有益补充,弥补了社会经济的不足。辽时期上京发展成为西方和东方的商旅、使节汇集的中心商业城市,城内设有负责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的都商税院。东京是东京道的商业贸易中心,设转运使,管理通商贸易等事。辽五京间各有驿道,西京可通沙洲、东京通高丽。上京、中京、东京又可北至女真、五国等部。封建化逐渐改变了女真人以物换物的原始状态,铜钱和纸币的使用,使金时期的商品交换得到飞速发展。

辽金朝代,朝贡和互市贸易是补充国内物资不足、与周边政权进行经济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拥有渤海控制权的辽朝,“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3](P.496)}实际上,辽与高丽、西夏、女真、吐谷浑、靺鞨、突厥、沙陀、波斯、大食、乌孙、吐蕃、于阗、高昌等五十多个国家有朝贡关系。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在边境地区设置多个榷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不仅每年得到宋朝40余万岁币,还以马、驼、羊、皮毛、银等来换取宋朝的茶、香药、缯帛、瓷、漆器、书籍等。金代修筑了从上京会宁府到燕京长达三千余里的驿道,是纵贯南北陆路交通的干线,极大地改善了南北各族人民的往来交通,并促进了南北物资运输与信息流动。金灭北宋后,将中原大批的能工巧匠强制迁往北方,也把中原各种先进技术带入北方,使北方地区的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辽金朝代经济结构的转变,不仅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为我国北方经济社会的开化进步提

供了基本条件和动力,也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依存互补、相互离不开的社会关系,为各民族交往交融创造了条件。

四、军事征伐:利益寻求与冲突中的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征服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同这种历史观完全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14](P.27)}在我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冲突屡见不鲜。北方游牧民族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单一性迫使他们渴望与中原地区加强物资交换,当正常的交换受到限制或存在障碍时,战争、冲突、掠夺就会发生。因此,战争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一定程度上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催化剂。

史料记载,“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撻,制之有术故尔。”^{[3](P.832)}故辽金两朝统治者都崇尚武力,往往通过“加之以兵”来确立对地区的统治,“凡辽十二宫、五京,皆太祖以来征讨所得”^{[3](P.800)}。辽金初建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低,器物产出不足,辽金统治者对周围部族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攻势,通过抢夺人畜财物、扩大地域范围等方式积累社会财富,其中达成媾和的邻国岁币、归附部族的朝贡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邻国岁币,诸属国岁供土宜”是“军国经费多所仰给”。唐天复二年(902年)时为大迭烈府夷离董的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3](P.2)}。辽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率大军征讨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十一月,攻取蔚、新、武、媯、儒等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3](P.11)}辽天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率兵与辽军战于出河店,“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8](P.29)}金朝初年,阿骨打率领女真族在反辽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继续攻克辽黄龙府后,与辽军主力战于护步答冈,

“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帟幄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8](P.31)} 成功占领辽的大部分领地之后,意气风发的阿骨打意欲“中外一统”,下诏书命令忽鲁勃极烈泉等人彻底消灭辽的残余势力,并收缴各类财物,“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8](P.38)} 这说明,金人不但在战争中抢获了辽的军械、财物和土地,而且也愿意吸收继承辽人的礼乐文化。天会三年,金朝将攻伐的目标锁定中原宋朝,第二年,金军开始大举南下伐宋,攻城略地,后“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世世子孙,永守誓言。”^{[8](P.86)}

史料所记载的辽金与周边其他政权之间的战争中,表面上看辽金获取了大量土地、粮食、牲畜、珍宝、军需用品等财富,但更为重要的是辽金掳掠迁徙了大批汉人和其他民族。军事移民以实州城,是辽金军事策略的集中体现。契丹、女真族人口较少,要对统辖地区建立长期稳固的政治统治,必须有大量从事农牧业的定居人口。所以,如史所载,“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太祖授钺专征,破室韦、于厥、奚三国,俘获庐帐,不可胜纪。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克郡县九,俘九万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讨奚,俘七千户。辽太祖即位五年,讨西奚、东奚,悉平之,尽有奚、霫之众。六年春,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亘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俘获甚众,振旅而还。秋,亲征背阴国,俘获数万计。”神册四年,辽太祖“亲征于骨里国,俘获一万四千二百口。五年,征党项,俘获二千六百口。攻天德军,拔十有二栅,徙其民。”“天赞三年,西征党项等国,俘获不可胜纪。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3](P.832)} 天显十一年,耶律德光带兵下晋阳,灭后唐,扶持石敬瑭当上傀儡皇帝,作为回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15](P.5980)}。自此,契丹人不但“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辖区内民族成份和民族结构也因此发生改变,更多民族共同生活在辽境内,为各民族相互联系、交往交流创造了条件。

女真人建立政权后,“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8](P.3167)}。金灭辽后,多次对宋用兵,并将俘获的人口迁徙到他处。金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天辅七年(1123年),金军攻占燕山府后,将

大批汉人迁到内地,“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8](P.1107)} “富室巨家悉被驱虏,止留空土。”^{[16](P.86)} 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城后,抢掠“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17](P.91)},攻占陕西后,将“陕右尽室迁辽东”^{[18](P.553)}。金熙宗以后,大批的猛安谋克户迁到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处,而有大批汉人北迁到女真地区。

辽金统治者与宋等其他政权之间因权力和利益而引发的战争,在扩大生存空间、改善生活状态、壮大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使大批契丹人、女真人与汉等其他民族交错杂处,通婚繁衍,实现民族融合。在辽金统治者的军事征服与强力政治统治下,汉人和其他民族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奴役和歧视,“但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9](P.194)}。因此,辽金统治者建立政权并南下攻伐侵占中原之地,一方面造成社会动乱,大规模人口迁移给各族人民的生活带来苦难,但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也空前活跃,开启了民族融合、北方社会走向进步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军事征服中利益寻求与冲突整合是促成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的演进逻辑。

五、文化交流与融合:儒家文化的浸润与滋养

契丹、女真族内迁后与中原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交往交流,必然形成文化上的深度融合。辽金朝代北部和东北地区多民族混居杂处,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其文化中糅杂了汉族文化、鲜卑文化、渤海文化、高丽文化、回鹘文化等多元文化成分,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原汉族文化。

建国前夕,辽金都仿制唐宋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治理制度。他们参照汉字创制文字,建立番学,定立官制、朝仪、礼乐、庙堂等制度,从表面上看,具有本民族特点,但处处闪现着中原文明的底色。如在官制上,辽朝效仿唐宋,“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到辽太宗时期,“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3](P.773)} 在官服上,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

僚用国服,其汉服用五代晋的遗制。在礼仪上,金朝“礼官参酌唐《开元礼》,定拟释奠仪数”。泰和六年,金廷下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丽泽门内。其制一遵唐旧。”七年,宣宗迁都汴州,“余会朝门内阙庭之右营庙如制,春秋上戊之祭仍旧。”^{[8] (P. 874)}可见,辽金朝代对中原文化与历史的礼遇和尊崇。在礼乐方面,金人攻入宋朝汴京后,将宫廷的典章礼乐全部据而有之,“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8] (P. 739)}所以,辽金朝代的宫廷礼乐制度大都承袭唐宋,使其文明开化程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勃兴之初的契丹族、女真族蒙昧无文字,建国后他们参照汉字并结合本民族语言特点创制了文字。金时期,随着女真族的快速汉化,女真文字被逐渐废弃,金世宗时期汉字成为法定的官方文字。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不仅促进了契丹人、女真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还为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提供了便利。史料记载,契丹人自侵取燕蓟以北地区后,“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20] (P. 3641)}这表明,辽人文明程度提高的背后是大量吸收并融合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和制度。

建国后,辽金政权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将儒家文化作为政权统治的思想基础,积极倡导儒学教育,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儒化的进程,最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辽初,统治者就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建孔庙,设官学,很多契丹人都精通经史。金朝承袭辽、宋,积极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金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儒学与儒家伦理道德对政权稳定的积极作用。金熙宗时期,在上京会宁府修建孔子庙,并亲临孔庙祭祀,其后又在东北、西北等地建孔庙,使儒家思想成为汉人、女真等民族的共同思想。据《金史·文艺上》记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8] (P. 3062)}女真人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依循辽、宋制设立科举制,并使其向前大为发展,“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8] (P. 1209, 1210)}如果说辽时期

的科举制度更多的是对汉人取士选才,那么金时期的进士科则以汉学取士,使女真科举与汉人科举并行实施,也使大量女真英才涌现出来。经过金王朝几代君主的大力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为女真人普遍接受,成为女真人文化思想的根基。

辽金时期思想文化儒家化趋向也使契丹、女真族的语言向汉语转变,契丹自太祖、太宗以后,各代君王都能说汉语,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积极学习并改说汉语,使汉语逐渐成为各民族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言。宋朝使臣许亢宗出使金国时,记叙道“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李荖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韦室,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5] (P. 154)}

契丹、女真族与汉等民族在思想、文化、语言方面的融合,又进一步促使风俗习惯融合向更广泛深入发展。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北宋路振出使辽朝时看到“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金章宗时期,王寂巡视辽东,在宜民(今辽宁省朝阳市黑城市镇)看到,“是日熟食背(寒食节),山林间居民携妻上冢,往来如织。”^{[21] (P. 26)}可见,北方民族的日常生活逐渐采纳吸收了中原汉人的传统习俗。

易姓更名在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也是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具体体现,如前赵刘渊、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萇等,都是少数民族改汉姓汉名的代表。辽代皇室贵族中很多人也起有汉名,如辽太祖阿保机汉名为“亿”,太宗汉名为“德光”,景宗汉名为“贤”,天祚帝汉名为“延禧”,淳钦皇后述律氏汉名为“平”,等。金朝历代君主不遗余力地提倡汉学,所以,金皇族汉化倾向较甚,取名时通常兼取女真名和汉名,如金太祖阿骨打汉名“旻”,太宗本名“吴乞买”,汉名“晟”,世宗本名“乌禄”,汉名“雍”,西北路兵马都统挾不也的汉名为“宗亨”,平章政事阿里罕的汉名为“宗尹”,谥班勃极烈、都元帅斜也的汉名为“杲”^{[22] (P. 401-407)}等。各民族相互交织、混合杂处的生活状态,使相互间通婚成为可能。辽金时期的通婚不仅在各部族的上层阶层和贵族中进行,在下层普通百姓中也广泛

存在。契丹族统一中国北方地区后,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民族发生交往和碰撞,通婚在各阶层民族间时有发生。金代各民族间的通婚较为普遍,甚至成为金统治者巩固政权的一项措施。随着女真族社会大规模的通婚,女真族逐渐淘汰婚姻旧俗,采用汉人的婚姻制度。大规模的民族间通婚,不自觉地加速了女真族与其他民族间交融的进程。

结 语

交融是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共同性不断增多的过程。辽金朝代我国北方地区社会形态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重大转折,这一时期,大批汉人融入北方契丹、女真社会中,也有大量契丹、女真等民族融入中原汉人中,不但对辽金的强盛和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地理环境来看,燕山山脉以北、蒙古高原地区相对封闭且气候干燥寒冷,而燕山以南地区开阔富庶、气候适宜,是促成契丹、女真人侵入中原地区的内在动力。从政治格局来看,契丹、女真立国以来,对北部及东北地区各民族进行整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一次民族大统合,奠定了以契丹、女真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与治理体系格局。从经济结构来看,辽金两代的多次人口北迁,使汉人开始进入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区,北方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上相依互补关系。从战争冲突来看,辽金立国初期,战争频仍,军事冲突时有发生。通过战争,辽金与中原地区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了解和联系,不同民族间交流与碰撞促使民族交融悄然发生。从文化融合来看,契丹、女真人对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推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儒化进程,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及我国北方地区社会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所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3]纵观历史可知,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是必然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新时代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条件与路径,值得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寻探灵光与智慧。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第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2] 魏收. 魏书(卷 100)·契丹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4] 王溥. 五代会要(卷 29)·契丹[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 赵永春. 编注. 奉使辽金行程录[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 [6]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1972(1).
- [7] 张家诚.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J]. 地理学报, 1982(2).
- [8] 脱脱. 金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9] 叶隆礼. 契丹国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0] 余靖. 武溪集(卷 18)·契丹官仪[M].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3.
- [11] 宇文懋昭著. 崔文印校证. 大金国志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2] 孙国军, 杨福瑞. 试论辽代州县制的推行与松漠草原城市化[J].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 [13] 张荣铮. 论金代民族融合[J]. 天津大学学报, 1984(3).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司马光著, 韩鹏杰主编. 资治通鉴(卷 280) 后晋纪一[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16]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 18)[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17]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4)[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8] 元好问. 遗山文集(卷 27)[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 26 年.
- [19]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0)[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21] 王寂. 辽东行部志注释[M]. 张博泉, 注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22] 王桐龄. 中国民族史[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20.
- [2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收稿日期 2022-11-09 责任编辑 罗 敏